



论中华传统文化典型价值论视野下的 情报观、信息观与知识观

马捷^{1,2} 顾英驰¹ 代云松¹ 侯怡凌¹

(1.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情报观、信息观、知识观作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三大核心观念, 始终贯穿于学科发展之中。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思想体系博大精深, 本研究立足中国哲学视角, 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墨道法典型价值论为分析工具, 对三观进行系统阐释与完善发展。基于概念分析提炼出三观的核心追问, 情报观聚焦服务指向、作用方式与可靠性, 信息观聚焦战略资产、效能实现与系统平衡; 知识观聚焦超越路径、认知框架与实践导向。进而从儒墨道法思想中凝练民本、利民、制度、整体、客观、诚信等 16 个价值维度, 实现现代学科追问与传统智慧资源的契合对接, 这一对接不仅可为既有学科观念强化文化基因, 也推动其价值维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本研究揭示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资源赋能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可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从“功能拓展”转向“价值自觉”, 进而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学科理论框架, 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与视角支撑。

[关键词] 情报观 信息观 知识观 中华传统文化 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 G250; G05 **DOI:** 10.13365/j.jirm.2026.03.065

[引用格式] 马捷, 顾英驰, 代云松, 等. 论中华传统文化典型价值论视野下的情报观、信息观与知识观[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6, 16(3): 65-77.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ions of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Representative Axiological Syste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 Jie^{1,2} Gu Yingchi¹ Dai Yunsong¹ Hou Yiling¹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2. Information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views of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serve as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sistently underpinning its developm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视野下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研究”(2025JZDZ099)阶段性成果之一。(This paper is one of the outcomes of the Major Special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itled "Research on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2025JZDZ099).)

[作者简介] 马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知识组织; 顾英驰(通讯作者),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组织, Email: Guycjlu@163.com; 代云松,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组织; 侯怡凌,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组织。(Ma Jie, Ph.D, profess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ing knowledge organization; Gu Yingchi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candidate,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Email: Guycjlu@163.com; Dai Yunsong, undergraduate,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Hou Yiling, master candidate,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oasts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rich in intellectual heritage.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employing the representative value theories of Confucianism, Mohism, Daoism, and Legalism with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nalytical tools to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 and refine these three views. Through conceptual analysis, the core inquiries of the three views are distilled: the view of intelligence focuses on service orientation, mode of 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the view of information focuses on strategic assets, effectiveness realization, and systemic balance; the view of knowledge focuses on transcendental pathways, cognitive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Subsequently, sixteen value dimensions, including people-oriented governance, benefitting the peop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olistic perspective, objectivity, and integrity, are extracted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Confucianism, Mohism, Daoism, and Legalism, thereby achieving a coherent alignment between contemporary disciplinary inquiries and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his alignment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existing disciplinary concepts but also further refines their system of value dimension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inherent logic through which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resources empower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roviding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functional expansion toward "value consciousnes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distinct Chinese autonomy.

[Keywords] Intelligence view; Information view; Knowledge vie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xiology

1 引言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面临国际学术竞争的外部冲击。这一挑战不仅体现在西方学术体系的长期主导地位,还涉及全球学术竞争格局的加剧以及我国原创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力不足等问题^[1]。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起步阶段以引进和学习国外思想为主,使得西方理论长期占据主体和引领地位^[2]。因此,突破既有框架、构建具有本土适应性的理论体系,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亟需回应的核心命题。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经历深刻的观念演进,从情报观到信息观到知识观的转变,构成学科发展的主线^[3],呈现出清晰的递进脉络:情报观回应“如何有效支撑决策”的实践需求,信息观拓展“如何系统配置资源”的管理维度,知识观则升华为“如何深度理解与内化意义”的哲学反思。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观念的功能性拓展,对观念背后的文化价值根基缺乏深入追问。学科尚未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基础理论体系,领域内争议较多,内行、外行对学科观念的认知都不深刻^[4]。传统文化为此带来契机,数智化转向正在推动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5]。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6]。传统文化在数智时代进入“数据化、指标化、治理化”的新阶段^[7],这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出新

挑战,也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挥其数据利用与分析优势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因此,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领域研究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本研究立足中华传统文化视野,遵循“追问提炼-文化赋能-阐释升华”的逻辑路径,以儒墨道法四家典型价值论为分析工具与思想根基,阐述与完善情报观、信息观、知识观(以下简称“三观”),为理解情报、信息与知识观提供不同于西方功能主义范式的文化主体性视角,为“三观”概念提供“中国注解”。

2 观念谱系:情报观·信息观·知识观的概念阐述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核心观念历经演变,呈现出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情报观被定义为从科技情报延伸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8]。信息观强调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财富与生产力要素。学界增加以信息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的内涵,是人类站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信息内涵的揭示^[9]。“情报”在学科语境中具有 information 与 intelligence 的双重视角差异。以健康信息学为例,Information 视角侧重于健康数据的采集共享与资源序化;Intelligence 视角则拓展为公共卫生风险预警与临床辅助决策,旨在将数据转化为直接驱动公共治理的“战略情报”。需要指出的是,情报观中的 information 视角指向情报工作的素材来源与加工对象,其落脚点在于为特定决策主体提供智力支持;

而信息观中的信息则作为独立的资源要素,关注其配置、转化与可持续发展。前者服务于决策支撑,后者服务于资源管理,二者虽有交叉,但在学科定位与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基本看法、见解与信念,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是人们伴随着知识的积累、丰富与增长对知识所作的一种意识和反思^[10]。基于上述概念阐述,“三观”的核心追问得以自然浮现。当情报观的服务范围从科技领域向社会需求拓展时,“情报应当服务于谁”成为不可回避的追问;当情报功能从文献管理转向决策支持时,“情报如何发挥作用”凸显出来;当技术冲击挑战传统方法论时,“情报如何保证真实”便成为核心问题。信息观从“战略资源与财富”到“生产力要素”再到“可持续发展”的递进,依次引出“信息何以实现价值跃升”“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可持续增长有无边界”三重追问。知识观从“知识积累”到“知识反思”再到“信念内化”的深化,则引发“知识本质的根本性转变”“何种视角理解与审视知识”“信念如何影响知识内化与选择”等核心问题。由此,本研究围绕上述核心追问展开辩证分析,旨在为后续的跨文化解读与理论对话构建清晰的阐释框架,如图1所示。

“大情报”范式下,数智时代的情报服务无可避免地面向愈发复杂的社会系统与公共治理需求^[11],这表明情报工作服务对象已突破传统科研院所的围墙,逐步向国家战略与广泛的社会生活延伸。其一,宏观层面的情报工作致力于构建覆盖国家安全、应急响应、医疗卫生健康等广泛社会需求的“大情报体系”,情报部门被赋予政府与社会治理的“耳目、尖兵、参谋”式角色^[12];其二,微观层面的智能情报服务模式深度嵌入产业技术创新的场景中。例如,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产业实践中,通过AI预测化合物、预警专利风险等方式驱动研发决策与迭代。该场景化创新驱动模式不仅推动情报服务走向智能化,更为智能时代的科技情报应用提供崭新的理论框架^[13]。可见,当代情报观的服务范围已逐步从单一科研支撑向全面社会赋能转移。

2.1.2 功能定位——作用方式重塑

情报活动在方法论层面被系统拆解为需求界定、采集、融合清洗、分析挖掘、提炼呈现等贯通式方法集^[14],为情报发挥直接干预作用提供操作保障。与此同时,科技情报行业正通过探索服务新模式、向高端智库转型等路径积极应对时代变局^[15]。转型核心要义在于,情报不能仅仅停留在数据呈现和信息汇总的浅层表述,而应透过海量数据探寻缘由、理清关系、预测趋势,从而为高层战略博弈和决策行动提供精准直接的支持^[12]。金融情报学、应急情报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勃兴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通过提供风控模型、危机干预等具体服务方案,直接切入实际问题域,重塑情报学的决策支撑功能^[16]。可见,情报的功能定位正发生实质性跃迁,全面转向深度的动态决策支持与智库服务。

2.1.3 技术冲击——可靠性追问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情报观的重塑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度赋能情报感知、分析与决策全流程。数智技术的介入极大拓宽情报视野,使得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深度挖掘成为可能,提升情报预测的精准度与战略洞察力,实现复杂信息环境下科技情报的卓智赋能^[17]。另一方面,技术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也对传统情报方法论构成严峻挑战^[18]。海量数据与智能计算叠加的背景下,情报结论的可靠性难以仅凭数据规模背书,智能算法的“黑箱”特性更对客观可信度提出全新考验。为筑牢信任基础,情报分析需引入可解释机制与评价方法,以支撑用户对机器生成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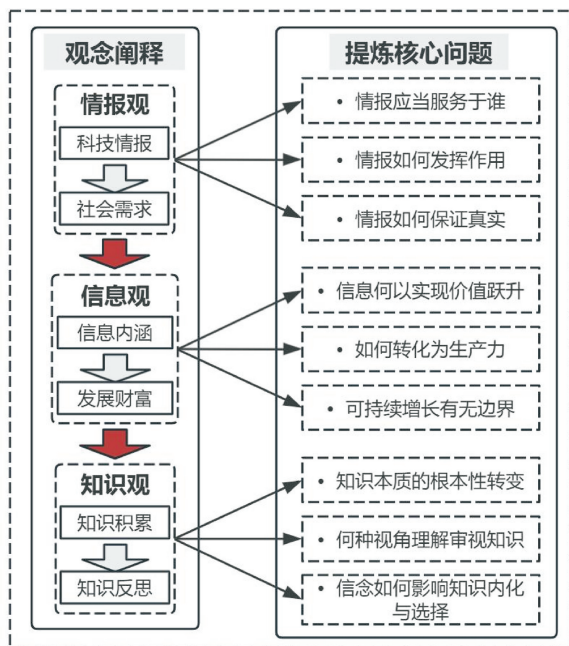


图1 “三观”核心问题提炼

Fig. 1 Extraction of Core Issues of the Three Views

2.1 情报观:范围、定位与技术冲击

2.1.1 对象范围——服务指向凸显

论的理解与信任^[19]。但盲目迷信算力无法产出高质量战略情报,唯有将传统分类、推理等凝结人类数百年的“情报智慧”注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实现算力与智力的深度咬合,方能在智能时代捍卫情报分析的可靠性与专指性^[20]。可见,随着服务范围扩大与功能定位升级,情报系统正经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刻冲击。

2.2 信息观:战略资源、生产力要素与可持续发展

2.2.1 战略性资源——战略资产确立

信息的资源属性体现为持续转化能力。当信息能够被有效获取、深度加工、广泛共享与协同使用时,其潜在价值才能真正显现为现实的财富性。其一,前沿交叉领域的信息服务通过快速响应、动态反馈与跨域联结,将分散需求与异质资源更高效组织,提升资源配置的敏捷性与协同效率,彰显信息的“战略调度”价值^[21];其二,在养老等多主体协作场景中,信息集成与数据模拟推动供给侧资源与业务平台对接,有效缓解配置分散、协同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呈现信息的“财富增益”效应^[22];其三,国家层面“数据要素”的顶层设计推动确权、流通与要素市场建设,为信息参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制度前提。可见,信息的战略性资源属性,不体现为静态的占有,而在于持续嵌入社会分工与治理体系,参与价值创造、扩散与分配的全过程。

2.2.2 生产力要素——效能实现机制

“数据要素/信息资源”之所以能在数字经济中获得关键要素地位,根源在于其可被组织、配置与再利用,能够嵌入产业链与治理链,形成可持续的价值提升^[23]。然而,这一效能的释放依赖于必要前提,即信息必须处于可流动、可配置、可协同的环境之中,否则要素化只能停留在名义层面,难以产生乘数效应。当数据流动受限时,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与协同效应将被显著削弱^[24],故信息要素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不取决于数据的规模,而取决于其是否进入可验证、可调用、可协作的生产流程。要素化的关键在于可用性与可联通性,而非单纯的可存储性。信息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机制体现为对生产方式与社会运行的深度驱动与前瞻引领,将信息从资源转化为直接作用于效率提升与结构升级的现实生产力^[25]。可见,信息作为生产力要素,其效能实现成为信息观必须回应

的核心命题。

2.2.3 可持续发展——系统平衡边界

信息的开放共享与价值释放需要在“增长-风险-秩序”中寻求动态平衡。其一,新质生产力被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学科发展亦需在其逻辑下构建新生态,通过数据、技术与组织方式的创新支撑长期发展动能^[26]。然而,信息流通带来的效率红利也可能在主体能力差异下转化为新的结构性不平衡,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边界不仅是安全底线,更是公平与秩序的制度边界。其二,信息促进可持续发展不能仅强调开放与流通,还须以安全、合规、可信为底线条件,隐私泄露等系统性安全风险侵蚀公共信任与制度稳定,使共享失去可持续性^[27]。综上,既要让数据“流得动”,也要让责任“追得上”。以规则、流程与责任结构推进信息文化培育与治理机制的制度化,方能在发展与约束之间达成动态平衡,从而构建可持续的信息治理路径。可见,寻求系统的平衡是信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2.3 知识观:转变、见解与信念的三重维度

2.3.1 知识转变——超越路径生成

知识认知正从“认知何种知识”转向“知识如何服务社会需求、如何实现价值”^[28]。这一转向的内在动因在于,当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知识的认知会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审视,进而追问知识的意义、边界与价值指向。其一,知识并非纯粹客观、形式化的命题集合,而是嵌入主体认知承诺与实践情境的默会结构。波兰尼批判了知识绝对客观化、中立化的科学理想,强调一切知识均包含认识主体的介入与价值投射^[29],重新确立知识与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对知识的反思延伸至主体认知方式、价值立场与实践背景。其二,伴随着知识爆炸与信息技术的冲击,学科呈现显著的技术驱动发展模式,研究重心日渐聚焦于知识的组织形式与传播机制,几乎放弃知识内容研究的“传统阵地”^[30]。可见,知识经历根本转变,知识研究亟需从形式化处理回归意义性审视。

2.3.2 知识见解——认知框架建构

知识见解体现为主体对知识本质、价值与形态的整体性认知。其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限知倾向”与“抑知倾向”两类取向^[31]。前者局限于人伦关系,强调道德修养;后者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强调顺从自然。两



种倾向的本质均是对知识应用边界与价值归宿的界定,表明知识并非中立存在,而是始终承载着特定价值目标与社会功能。其二,无序、分散的信息难以转化为有效经验,通过序化、整合与结构化组织,信息方可形成系统知识并释放内在价值^[32]。其三,应当以复杂思维理解知识^[33],表明应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在多元、动态与关联的视野中把握知识属性。可见,对于理解知识的完整视角,需从价值目的定位知识、以存在形态建构知识、用复杂思维统合知识审视。

2.3.3 知识信念——实践导向彰显

知识信念是知识观的深层维度,不仅是个体关于知识的认知框架,更会内化为个体判断信息、选择知识的深层依据,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与实践活动。其一,信念能够联结知识与主体的情感、需要、意识,作用于个体对知识的信奉及其向思想、信念转化的内化过程^[34]。知识在从“外在认知”转化为“内在秉持”并最终驱动实践选择过程中,信念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其二,知识就是能用理由证实的真信念^[35],揭示知识并非孤立的信息碎片,而是经过理性证实、被主体秉持的信念状态。其三,社会人群的知识与信念能否实现协调、公平发展,将成为衡量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尺度^[36]。可见,知识信念不只是个体认知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考量维度。从信念基础,到个体层面的信念内化,再到社会层面的信念发展,三重意涵共同揭示信念在知识观中的核心地位。

综观“三观”的内涵阐述,其演进深刻体现学科发展的功能合理化取向,围绕“如何更好地获取、处理、传递与运用信息知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然而这种以效率提升和应用优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侧重于工具层面的功能拓展。学界已认识到文化价值维度的重要性,部分研究从本土视角切入,讨论传统“民本”“诚信”等概念与学科发展融合^[37-38],为“三观”的本土化探索奠定有益基础。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对接,尚未形成贯穿性的价值论分析框架,对观念背后的文化价值根基缺乏深入追问:情报观关注“为谁服务”却较少追问“何以正当”,信息观探讨“如何增值”却较少反思“分配正义”,知识观强调“如何反思”却疏于审视“为何反思”。“三观”演进所展现的功能逻辑与文化维度的相对缺位,恰为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提供了阐释空间。

3 思想根基:儒墨道法的价值论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已有学者对信息资源管理与中国哲学视角融合进行探索,以助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土化发展^[1]。价值论作为哲学主干学科之一,为现实生活重大问题的解决确定立场、揭露根源、指明方向^[39]。其中文化价值论,强调文化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的战略意义^[4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在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中具有独特地位,“九流十家”作为先秦诸子思想的主流分类^[41],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四家思想因其内涵的系统性、价值的普适性与实践的指导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支柱^[42]。有学者从价值论视角对儒墨道法思想进行了概念界定,阐释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论、墨家的功利价值论、道家的自然价值论与法家的权力价值论^[43-44]。故本研究以四家典型价值论为逻辑起点,提炼核心维度,旨在挖掘其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内在契合性,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观念阐释与升华提供适配性的本土思想资源。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根基的挖掘与提炼过程中,本研究遵循哲学诠释学中的“前理解”与“文本阐释”路径^[45]。首先,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现实困境作为“前理解”的阐释起点,提炼出学科演进中的核心追问;随后,在儒墨道法元典中检索具有逻辑相关性的表述。通过对元典语境的“去语境化”处理,将历史性的治理经验转化为具有学科普适性的16个价值维度,实现从历史文本向理论范畴的逻辑跃迁,思想根基提炼如图2所示。

3.1 儒家道德价值论:伦理秩序维度

首先,在民本维度,儒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生福祉置于政治评价的最高位置。该思想在先秦时期与儒家“仁政”理念深度融合,并发展出“施仁政于民”的政治主张。民本并非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一种长效的政治评价尺度。其次,在义利维度,儒家强调利益获取必须接受道义原则的规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奠定儒家处理利益与道义关系的基本原则,指明正当利益应当以合乎道义的方式获取,在“得利”之前须先问“是否合乎义”^[46]。该维度追问“价值取舍的道德规约”,其核心回答是“以义为利之本,见利思义”。再次,在诚信维度,儒家将诚信视为维系社会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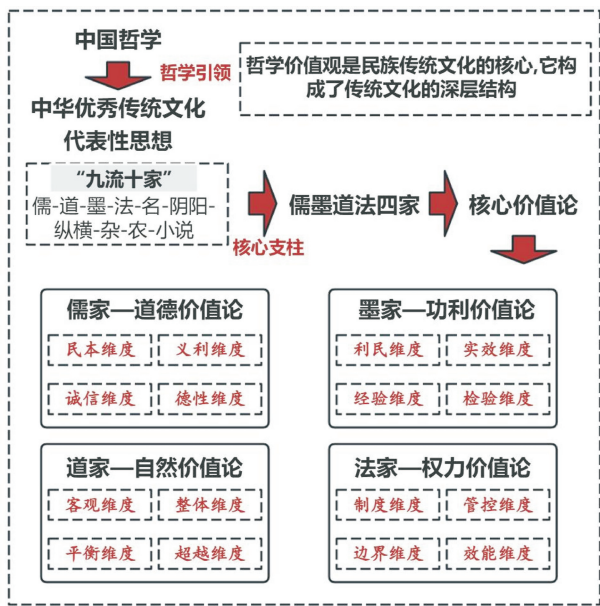


图2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根基提炼

Fig. 2 Extra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与政治运行的重要伦理前提。例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将“诚”从一般道德规范提升至人与宇宙秩序相互感通的本体论高度。儒家体系中,“诚”既存在本真也是主体之自律,为社会信任网络的生成奠定深层根基。此外,在德性维度,儒家将知识追求与德性养成统一起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为君子尊崇德性而探讨学问,奠定儒家知识论的根本原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揭示知识追求的终极目的。求知通过格物致知,最终达成人格修养与天下治理的统一。本研究提炼的儒家核心命题与分析维度见表1。

表1 儒家道德价值论核心命题及分析维度

Table 1 Core Propositions and Analysi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Moral Axiology

核心命题	原文出处	提炼维度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民本维度:确立公共福祉作为政治秩序及情报运作的标准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义利维度:构成个体修养的重要准则和社会治理的价值根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中庸》	诚信维度:维持社会秩序的长效稳定
“尊德性而道问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中庸》 《大学》	德性维度:为理解知识的内化与选择提供价值尺度的根基

3.2 墨家功利价值论:实用理性维度

在利民维度,墨家强调思想与实践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指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将道德原则与社会实效直接贯通。墨家的“利”具有严密的公共标准与可验证性,其价值判断始终以社会整体的实际改善为准绳,坚持通过现实后果来推导规范结论,其论证体系呈现出极强的功效检验特征。在实效维度,墨家强调“有用”必须通过现实结果验证。“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将实践效果确立为检验价值的最终尺度^[47],检验任何言论、政策或知识价值,必须诉诸实际施行后检验社会效果,唯有在实践中带来民生改善、国家安定,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在经验维度,墨家形成了明确的基于经验的知识分类意识,提出“知:闻、说、亲”的知识来源系统分类,将亲身实践获得的客观知识、通过推理形成的知识,以及从前人那里继承的间接知识加以区别,确立三种基本的知识获取途径。在检验维度,墨家提出判断言论或知识的可靠性三重检验标准,第一表“本之”,即以历史经验为据;第二表“原之”,即以现实经验为据;第三表“用之”,即以实践效果为据。本研究提炼墨家核心命题与分析维度见表2。

表2 墨家功利价值论核心命题及分析维度

Table 2 Core Propositions and Analysis Dimensions of Mohist Utilitarian Axiology

核心命题	原文出处	提炼维度
“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中》	利民维度:为情报的实际效能提供评价依据
“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非命上》	实效维度:体现以实践检验真理的传统
“知:闻、说、亲”	《墨子·经上》	经验维度:体现对知识来源多元性与可靠性层级的自觉区分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子·非命上》	检验维度:体现对知识验证多重标准的系统建构

3.3 道家自然价值论:生态智慧维度

在客观维度,道家关注认知主体如何在去执与反思中接近事物本然。“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将把握事物发展的不变规律作为认知的最高境界,构成传统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客观主义认知路径^[48]。在整体维度,道家强调事物内在关联与整体生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万物统摄于宏大的层级关联之中。在平



衡维度,其思维方式以结构关联为底色,认识路径强调系统互动,揭示技术发展与人心异化的内在关联。“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警示世人技术手段越是发达,人心便越容易丧失本真,提醒人们追问技术的进步是否以人性的异化为代价,效率的提升是否以生命意义的丧失为补偿。在超越维度,道家对知识的理解指向对知识限度的反思与超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揭示知识积累与智慧体悟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学日益”指向经验知识的不断累积,“为道日损”则要求减损对已有知识的固守。“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警示以有限追逐无限终将陷入困殆。本研究提炼道家核心命题与分析维度见表3。

表3 道家自然价值论核心命题及分析维度
Table 3 Core Propositions and Analysis Dimensions of Daoist Natural Axiology

核心命题	原文出处	提炼维度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道德经》第十六章	客观维度:体现消解主观偏见、把握运行规律的认知方法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整体维度:揭示从系统关联中把握事物运行的整体性思维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庄子·天地》	平衡维度:为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平衡提供边界意识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庄子·养生主》	超越维度:揭示知识积累与智慧超越的辩证关系

3.4 法家权力价值论:制度规范维度

在制度维度,法家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理解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制度在政治秩序中的基础地位,使政治运行逐渐呈现出以权力秩序为核心的制度逻辑^[49]。在管控维度,法家关注信息、资源与权力如何通过制度机制实现有效管控。“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指君主的耳目再聪慧,若仅依赖一己之力,终究无法避免被蒙蔽的命运^[50]。资源的管控、信息的流通不能依赖个人贤能,而必须依托制度化参验之术,实现对人力、物力、信息等资源的掌握与配置。在边界维度,法家将制度要求延伸至知识传播领域,划定何种知识能进入合法秩序。“以法为教”即以国家法令为教育内容,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必须使民众懂法、守法。最后,在效能维度,

法家对知识价值的判断仍落脚于国家治理成效,将实际功用作为核心衡量标准。“故治国者,其搏力也,以富国强兵也”意为只有服务于国家实力增长的知识才具备价值,凡不能带来国家富强、不能提升军事效能的知识,都应当予以摒弃。本研究提炼法家核心命题与分析维度见表4。

表4 法家权力价值论核心命题及分析维度
Table 4 Core Propositions and Analysis Dimensions of Legalist Power Axiology

核心命题	原文出处	提炼维度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	制度维度:体现通过规则为情报系统提供稳定嵌入路径的程序理性
“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	《韩非子·定法》	管控维度:体现以制度化参验机制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掌握与配置
“以法为教”	《韩非子·五蠹》	边界维度:体现知识合法性须接受制度边界规约的传播原则
“故治国者,其搏力也,以富国强兵也”	《商君书·壹言》	效能维度:体现以国家治理成效为衡量标准的知识价值判断

4 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情报观、信息观与知识观对接阐释与理论升华

本研究基于对“三观”演进脉络的梳理与儒墨道家思想根基的阐释,针对“三观”的核心追问提炼相应的传统文化解释维度,为后续深度阐释奠定了分析框架(表5)。对位关系框架遵循三重核心原则:其一,追问本质的精准匹配,以学科核心问题为锚点,为传统价值论的介入构建明确的问题接口;其二,价值论资源的天然契合,传统价值体系与学科问题意识形成内在同构,实现问题指向与思想回应的精准适配;其三,逻辑链条的贯通贯穿,以“观念-追问-调用维度”为核心逻辑闭环,保障二者对接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追问与调用维度对位时采用“视界融合”的方法论^[51],旨在将学派间的差异视为学科系统中“内在德性”与“外在机制”的辩证统一。这种路径强调诠释的“应用”本性,通过将传统智慧植入现代学科框架,构建起一个刚柔并济、体用相生的本土理论生态,从而回应从“功能拓展”转向“价值自觉”的时代需求。

4.1 情报观——“服务指向”“作用方式”“可靠性”的价值整合

情报观所呈现的服务范围向社会延伸的趋势,明确

表5 四重价值论与三观演进的对位关系
Table 5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fold
Axi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Views

观念	追问	调用维度
情报观	服务指向:情报应当服务于谁?	儒家民本、墨家利民
	作用方式:情报如何发挥作用?	法家制度、道家整体
信息观	可靠性:技术冲击下情报如何保证真实?	道家客观、儒家诚信
	战略资产:信息何以实现价值跃升?	法家管控
	效能实现:信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	墨家实效、法家效能
知识观	系统平衡:可持续发展有无边界?	道家平衡、儒家义利
	超越路径:知识的本质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转变?	道家超越
	认知框架:以何种视角理解与审视知识?	墨家经验、墨家检验
	实践导向:信念如何影响知识的内化与选择?	儒家德性、法家边界

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但对其背后的伦理正当性尚需进一步追问。若情报仅服务于权力运作本身,则易滑向工具主义;若只强调技术效率,又可能忽视社会后果。故情报体系应当确立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立场,使资源配置与议题选择具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儒家的民本原则,将社会成员福祉置于政治评价的核心位置,以公共利益为政治正当性的根本尺度^[52],揭示情报资源配置与议题选择须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起点。但仅有价值宣示仍不足以形成完整逻辑,若公共导向缺乏现实功效的检验,其规范意义易流于空泛。墨家的利民取向,将制度合理性与现实功效直接贯通,使政治行动具有明确的实践检验标准^[53]。儒家民本原则提供价值正当性,墨家利民标准提供实践可证性,两者共同确立了情报体系的公共导向,从而完善情报观“服务指向”的追问,不仅回答“为谁服务”,更从价值正当性与实践可证性双重层面回应“何以正当”。

情报观所揭示的功能向决策支持转型的趋势,其持续稳定性仍有赖于制度化保障与系统性视野的有机融合。若情报仅作为信息供给存在,其作用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偏好,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治理影响。法家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执行刚性决定治理效能,核心在于以制度化规则取代个人判断,使治理过程具备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情报体系中,这一原则要求建立固定报告机制、情报评估程序及反馈制度,使情报成为决策流程

中的制度性环节。但过于僵化的制度结构可能导致信息分割与部门壁垒,使情报视野局限于既定框架。道家的整体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要求在复杂关系网络中理解事物运行^[54]。法家制度理性提供稳定的结构框架,道家整体思维则强化跨系统协调能力,二者共同完善情报观“作用方式”的追问,使情报既能稳定进入决策结构,又能保持全局分析视野,在制度刚性与系统柔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技术冲击下可靠性挑战表明,情报客观性的保障不能仅依赖技术手段,需在认知方法与主体伦理两个层面共同着力。道家的客观原则,体现出对认知偏差的深刻警惕,强调通过消解主观偏见以接近事物真实状态^[55]。情报实践中,体现为多源信息交叉验证、数据溯源机制与透明化分析流程等严格的方法论要求。然仅依赖技术方法仍不足以完全防止信息失真。情报活动涉及信息筛选与解释权,若主体缺乏伦理约束,分析结果仍可能被扭曲。儒家的诚信伦理,不仅是个人道德原则,更是维系社会信任的重要机制^[56]。道家客观原则维护认知真实,儒家诚信伦理保障主体可信,二者共同完善了情报观“可靠性”的追问,使情报的客观性基石建立在方法可靠与主体可信的双重保障之上。

4.2 信息观——“战略资产”“效能实现”“系统平衡”的价值对话

信息观所揭示的“资源”向“资产”转化的制度化整合需求,触及战略资产的核心机制。信息的战略资源与财富属性,不体现为静态占有,而在于其持续嵌入社会分工与治理体系,参与价值创造、扩散与分配的全过程。法家的管控逻辑,揭示信息从分散的个体认知整合为系统性治理资源的制度路径。通过制度化的收集、整合与配置机制,使分散的信息进入可流通、可配置、可治理的轨道,从而实现从零散资源向战略资产的跃升。数据要素的构建延续这一逻辑,其价值释放依赖于完善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机制,核心在于将分散、异构的数据资源通过制度设计整合为可计量、可交易、可治理的资产形态^[57]。法家管控维度与之相契合,信息之所以能够成为财富,关键在于制度化的整合机制使其从不可见、零散的存在转变为可配置、可计量的治理对象。完善信息观“战略资产”的追问,不仅承认信息的财富属性,更从制度化整合机制层面阐明价值实现的路径。



信息观聚焦于信息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与机制,但对其效能的评判标准尚需进一步明确。信息作为生产力要素,其效能的实现需要回答“何种信息能够带来可衡量的治理绩效”。墨家强调实践是检验价值的最终标准,唯有能够在实际运行中带来民生改善、国家安定的知识,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法家则将知识的价值判断与国家的治理绩效直接挂钩,要求智力活动以能否转化为制度执行、资源动员与秩序塑造的实际效能来判定其价值。数据价值的释放不仅取决于数据本身的规模与质量,更取决于数据能否在跨部门、跨层级的协作中被有效调用,以及这种调用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服务改进与治理效能提升^[58]。信息生产力的实现,既需要墨家的“实践检验”,即信息是否真正服务于民生改善,也需要法家的“制度整合”,即信息能否在治理体系中被高效配置与协同调用。墨家实效与法家效能的双重尺度,完善信息观“效能实现”的追问,回应“分配正义”这一问题。

信息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外部性风险与边界约束,对其发展的价值尺度提出校准要求。道家的平衡与儒家的义利之辨,揭示信息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效率与风险的权衡,更关乎利益追求是否合乎道义,二者共同构成信息系统发展的边界意识,既要防范技术异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要确保信息活动不偏离社会正义的轨道。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加剧数据垄断、算法歧视与数字鸿沟,因而需要在制度设计中嵌入公平、透明、问责等价值原则,防止效率逻辑压倒道义逻辑^[59]。信息的采集、流通与利用需要设定边界,故需构建包容性的数字治理框架,需要在促进数据流通的同时保障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尊重地方性知识与文化多样性。道家平衡维度提供系统边界的预警,儒家义利维度提供道义规约的约束,二者共同完善信息观“系统平衡”的追问,使信息发展从单一效率导向转向效率与正义、增长与包容的动态均衡。

4.3 知识观——“超越路径”“认知框架”“实践导向”的价值超越

知识认知正从“认知何种知识”转向“知识如何服务社会需求、如何实现价值”,这触及对知识本质的根本追问。道家的超越智慧为此提供解读路径。“为学日

益,为道日损”,知识的不断累积逐步实现对知识本身的超越,同时也要减损成见、减损执着、减损对已有知识的固守。知识积累不是终极目的,若沉迷于无尽的知识追逐而不知返本归真,便背离求道的本意。道家超越维度揭示了知识本质从“对象性存在”向“主体性关联”的根本转变。知识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而是与主体的认知方式、价值立场、实践背景深度耦合的动态过程。知识爆炸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为道日损”的智慧,真正的知识不在于占有多少,而在于前瞻性地洞察知识创新与扩散的潜力和趋势^[60]。这一维度完善知识观“超越路径”的追问,将知识反思从方法论层面的技术操作,提升为对知识本质的哲学审视与价值自觉。

知识见解的多维性从价值目的、存在形态等视角呈现了理解知识的复杂图景,但如何整合这些视角、如何确保知识的可靠性,尚需系统的认知框架予以支撑。墨家为此提供系统的认知框架。其一,理解知识首先需要追问其来源,尤其是在大模型生成内容存在幻觉风险的情境下,知识服务的不可靠性特征更凸显这一追问的必要性。其二,“三表法”为知识标准提供了多元检验体系,构成知识可靠性的完整判据。墨家认知框架揭示,理解知识需要把握三重维度,即从价值目的看知识的服务指向,从存在形态看知识的系统建构,从检验标准看知识的可靠性判据。这一维度完善知识观“认知框架”的追问,使知识理解从单一尺度走向多元框架,从片面把握走向整体审视,既要追问知识“从何而来”,也要追问知识“如何判断”,更要追问知识“为何反思”。

知识信念在知识内化与选择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但信念的形成机制及其价值指向尚需进一步厘清。实践导向追问信念如何影响知识的内化与选择,需从内在价值根据与外在制度规约两个层面理解。内在价值根据方面,儒家德性维度揭示,知识信念不仅是“信其为真”,更是“信其为善”。人们对知识的秉持,既基于其可靠性,更基于其与人的价值关联。知识的内化是外在信息转化为内在认知的过程^[61],信念在此充当情感枢纽与价值根据。而外在制度规约方面,法家边界维度揭示,制度环境影响知识信念的形成,体现制度规训机制具有普遍意义,制度通过知识筛选、评价与传播塑造着人们对知识价值的判断。当算法生成知识结论时,制度化的可解释性标准可影响知识采纳。儒家德性维度

提供内在根据,法家边界维度提供外在机制,二者共同完善知识观“实践导向”的追问,揭示信念既是知识内化的结果,也是行动选择的动力。

4.4 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观念的价值自觉图景

本研究以“追问提炼-文化赋能-阐释升华”为分析框架,对情报观、信息观、知识观进行系统阐释。追问提

炼层,“三观”演进呈现从“价值整合”到“价值对话”再到“价值超越”的递进逻辑,分别锚定各自的核心追问;文化赋能层,儒墨道法四家价值论中16个维度与三观核心追问实现精准对接;阐释升华层,传统文化基因的注入推动三观从效率导向转向复合型价值体系,实现从功能拓展到价值自觉的演进,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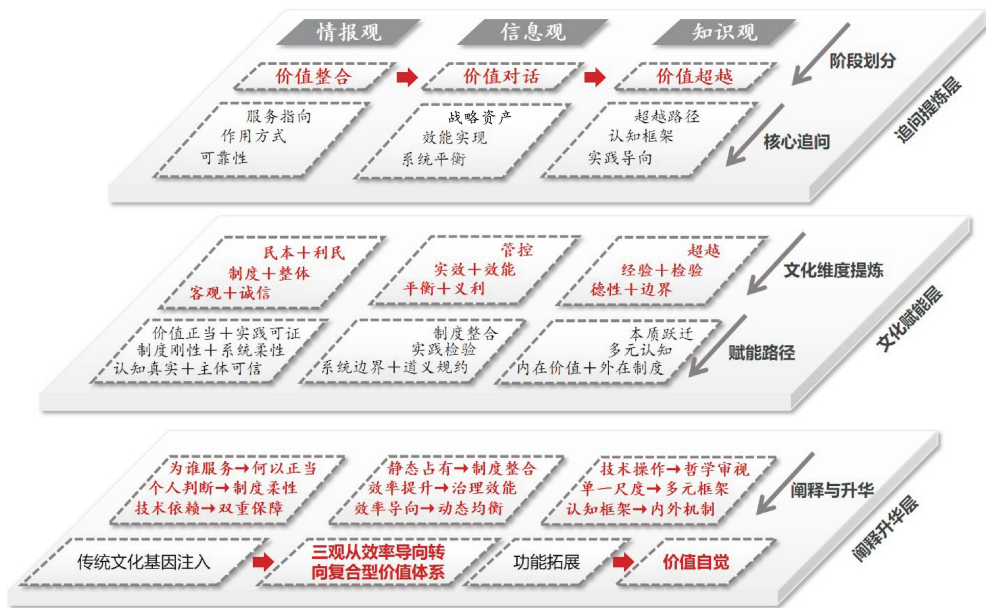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文化赋能三观演进的逻辑机制:从追问到升华
Fig. 3 Logical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mpowe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Views: From Inquiry to Sublimation

本研究认为,破解西方功能主义范式的局限,走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土化路径,需从三个层面回应核心议题。其一,文化赋能的本土化路径如何避免陷入“文化标签化”困境。传统文化价值论与学科核心追问的对接,不应停留于概念层面的比附,而需真正内化为学科观念建构的逻辑根基。如何在坚守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核心功能逻辑的前提下注入本土价值基因,在本土文化根脉与全球学术话语间寻求动态平衡,是文化赋能能否实现深层转化的关键。其二,“三观”体系的完善如何在功能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达成辩证统一。传统“民本利民”“道法自然”等思想虽为学科提供了价值锚点,但若过度强调价值而忽视学科的实践效能,则可能走向“价值空转”。如何将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信息治理的技术逻辑,效率诉求有机结合,使价值理性与功能理性相互支撑而非彼此消解,是“三观”完善必须回应的核心

命题。其三,学科本源的契合性是静态匹配还是动态建构。传统文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关联并非天然成立,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验证不断生成。如何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保持理论的开放性,使传统思想资源能够在回应时代问题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是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适应性学科发展方向的根本课题。唯有解决上述议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本土化概念路径才能真正从“文化赋形”走向“文化铸魂”,构建起兼具中国气派与时代价值的学科发展图景。

5 结语

本研究以儒墨道法四家价值论为分析工具,对情报观、信息观、知识观演进中的核心追问进行系统阐释,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本土理论建构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路径。研究表明,“三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论呈现出显著



的结构性对应,这不仅展现了传统思想跨越时空的理论生命力,更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重塑信息资源管理核心观念提供高度契合的本土价值底座。这使得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实质性介入核心观念建构的思想资源,从而推动中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在借鉴外来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自身的价值根基与理论主体性。然本研究尚属初步探索,对儒墨道法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及

各家学派内部的张力未能充分展开,“三观”追问与分析维度的对应关系也需在更广泛的经验研究中加以检验。未来将进一步探讨传统价值论在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中的转化机制,将民本、诚信、实效、检验、平衡、制度等维度融入情报伦理、信息治理与知识管理的具体实践,在人工智能时代探索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融合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费成, 陈帅朴, 陈景龙. 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 图书情报知识, 2025, 42(2): 6-21. (Ma F C, Chen S P, Chen J L.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in China[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5, 42(2): 6-21.)
- [2] 杨思洛, 吴丽娟. 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 图书馆论坛, 2024, 44(10): 1-9. (Yang S L, Wu L J.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science in China[J]. Library Tribune, 2024, 44(10): 1-9.)
- [3] 赵蓉英, 侯经川. 近十年来情报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思考[J]. 图书情报知识, 2003, 20(6): 9-12, 96. (Zhao R Y, Hou J C.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late ten years[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3, 20(6): 9-12, 96.)
- [4] 杨建林. 关于重构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思考[J]. 情报学报, 2020, 39(2): 125-134. (Yang J L.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ng the foundational theory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0, 39(2): 125-134.)
- [5] 李慧, 刘祝一, 王乾宇, 等. 面向科技文献的多维度学科交叉特性研究——以数字人文领域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25, 69(3): 64-77. (Li H, Liu Z Y, Wang Q Y, et al. Research on multi-dimens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digital humaniti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5, 69(3): 64-77.)
- [6] 胡希琴, 别立谦, 汪聪, 等. 高校图书馆体系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略探究——以“北京大学阅读文化节”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5, 43(5): 109-117. (Hu X Q, Bie L Q, Wang C, et al. Exploration of strategies for systematizing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cademic libraries-taking the reading culture festival of Pek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25, 43(5): 109-117.)
- [7] 钱明辉, 许嘉元, 王驰, 等. 我国文化数字化创新评价体系及实证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5, 69(3): 14-24. (Qian M H, Xu J Y, Wang C, et al. Culture digitalization innov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5, 69(3): 14-24.)
- [8] 卢太宏, 杨联纲. 变革中的情报工作——新的观念与新的方式[J]. 科技情报工作, 1987(4):2-5.(Lu T H, Yang L G. New concepts and new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work in transition[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Work, 1987(4): 2-5.)
- [9] 袁红. 浅论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观[J]. 图书情报知识, 1998(1): 11-13, 33. (Yuan H. On the information vie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1998(1): 11-13, 33.)
- [10] 柯平, 张瑜祯. 中国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理论探索与发展路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6, 52(1): 4-20. (Ke P, Zhang Y Z.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6, 52(1): 4-20.)
- [11] 许鑫, 叶丁菱. 数智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展透视[J]. 情报学报, 2022, 41(10): 1100-1110. (Xu X, Ye D L.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the era of data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2, 41(10): 1100-1110.)
- [12] 苏新宁. 智能时代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J]. 情报学报, 2025, 44(2): 123-131. (Su X 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futur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5, 44(2): 123-131.)
- [13] 魏锦钰, 毛进, 李纲, 等. 面向产业技术创新的智能情报服务模式研究: 场景驱动创新的视角[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5, 15(6): 5-19. (Wei J Y, Mao J, Li G, et al.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intelligence service model for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5, 15(6): 5-19.)
- [14] 化柏林, 李广建. 面向情报流程的情报方法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16, 35(2): 177-188. (Hua B L, Li G J. Constructing method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based on intelligence process[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6, 35(2): 177-188.)
- [15] 李萌. 大数据时代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新思考[J]. 中国软科学, 2016(12): 1-4. (Li M. New consider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 in the big data er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6(12): 1-4.)
- [16] 马费成, 张帅.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探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2): 4-14. (Ma F C, Zhang S.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in library and in-

- 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3, 49(2): 4-14.)
- [17] 赵志耘. 论复杂信息环境下的科技情报卓越赋能[J]. 情报学报, 2022, 41(12): 1229-1237. (Zhao Z Y. Out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in complex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2, 41(12): 1229-1237.)
- [18] 赵志耘. 论科技情报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 情报学报, 2024, 43(12): 1379-1385. (Zhao Z Y. Empowering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4, 43(12): 1379-1385.)
- [19] 靳庆文. 情报分析中的可解释性技术及其评价方法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44(4): 24-34. (Jin Q W. Research on interpretability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method in information analysis [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23, 44(4): 24-34.)
- [20] 苏新宁. 传统知识组织方法的智能力[J]. 科技情报研究, 2024, 6(1): 1-9. (Su X N. Intelligent capabilitie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ethods[J].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search, 2024, 6(1): 1-9.)
- [21] 孙建军, 马亚雪, 李阳. 面向前沿交叉领域的信息服务路径思考[J]. 图书与情报, 2024(6): 1-9. (Sun J J, Ma Y X, Li Y. The thinking on information service path for frontier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24(6): 1-9.)
- [22] 练靖雯, 李新月, 赵宇翔, 等. 数智协同, 颐养共筑: 智慧养老数据资源建设的多主体协作机制探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5, 48(7): 19-28. (Lian J W, Li X Y, Zhao Y X, et al. Exploring the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in smart senior care data resources development[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5, 48(7): 19-28.)
- [23] 孙建军, 李阳.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视角下的数据要素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24, 41(2): 6-12. (Sun J J, Li Y. Research on data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J]. Document, Informaiton & Knowledge, 2024, 41(2): 6-12.)
- [24] 蔡跃洲, 马文君. 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3): 64-83. (Cai Y Z, Ma W J. How data influe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 factor and the restriction of data flow[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1, 38(3): 64-83.)
- [25] 蒋永穆, 薛蔚然. 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4(5): 81-92. (Jiang Y M, Xue W R. Systematic framework and path desig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24(5): 81-92.)
- [26] 初景利, 刘敬仪, 李楠. 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新生态[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5, 15(2): 13-19. (Chu J L, Liu J Y, Li N. Constructing a new ecolog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development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5, 15(2): 13-19.)
- [27] 盛小平, 郭道胜.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的数据安全治理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22): 25-36. (Sheng X P, Guo D S. Research on data security governance in open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0, 64(22): 25-36.)
- [28] 张晓林. 走向知识服务: 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 26(5): 30-35. (Zhang X L. Towards knowledge services: Seek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0, 26(5): 30-35.)
- [29] 李白鹤. 波兰尼的“默会认识”思想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9(4): 501-505. (Li B H. On Polanyi's concept of tacit knowing[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6, 59(4): 501-505.)
- [30] 熊静, 陆滢竹. 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内涵、学术特征及书写框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5, 51(4): 16-30. (Xiong J, Lu Y Z.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writing framework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5, 51(4): 16-30.)
- [31] 金胜勇, 刘雁. 论知识共享的价值观[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 3: 17-20. (Jin S Y, Liu Y. On values of knowledge sharing[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3: 17-20.)
- [32] 曹思源, 马海云. 领域知识组织理论基础及方法分类简述[J]. 情报资料工作, 2021, 42(5): 14-22. (Cao S Y, Ma H Y.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 classification of doma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21, 42(5): 14-22.)
- [33] 邹云龙. 以复杂思维看待信息素养教育[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0, 38(4): 70-75. (Zou Y L. A study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hrough complex thinking[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20, 38(4): 70-75.)
- [34] 王苏丫, 刘长海. 知识的信念意蕴: 教学过程中的信念培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5(2): 73-80. (Wang S Y, Liu C H. Belief implications of knowledge: Belief cultivation in teaching [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2025 (2): 73-80.)
- [35] 杨建林. 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再认识[J]. 情报学报, 2020, 39(3): 317-329. (Yang J L. Rethink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0, 39(3): 317-329.)
- [36] 王子舟. 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理性走向[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 5: 4-10. (Wang Z Z. Rational trend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3, 5: 4-10.)
- [37] 陈传夫, 陈一.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中国实践及其理论贡献[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1): 4-21. (Chen C F, Chen Y. Chinese practice of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3, 49(1): 4-21.)
- [38] 苏新宁. 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 47(4): 16-27. (Su X N.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 47(4): 16-27.)
- [39] 江畅, 左家辉. 重新认识价值论的性质[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5): 80-89. (Jiang C, Zuo J

- H. Re-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axiology[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60(5): 80-89 .)
- [40] 王承贵, 李智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意蕴及其实践启示[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12): 18-26 . (Wang Y G, Li Z L . Th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of Xi Jinping' s cultural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J].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2025(12): 18-26 .)
- [41] 韩品玉, 庄琪. 国学百科 诸子学说[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21: 12-14 . (Han P Y, Zhuang Q .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studies: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M]. Jinan: Publishing House of Jinan, 2021: 12-14 .)
- [42] 黄承梁. 老子之道和现代文明建设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6 . (Huang C L . A study of Laozi' s Tao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6 .)
- [43] 赵馥洁.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73 . (Zhao F J . Theory of val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M]. 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9-173 .)
- [44] 20年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4): 158-168 . (Research on value philosop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9 (4): 158-168 .)
- [45] 洪典鼎. 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7): 114-139, 206-207 . (Hong H D . On the concept of auslegung(interpretation)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1(7): 114-139, 206-207 .)
- [46] 曾海龙. 君子之道与庶民之德: “小人喻于利”新诠[J]. 社会科学, 2025(8): 54-63 . (Zeng H L . The way of the Junzi and the virtues of the Shumi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xiaoren has an eye for profit"[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5 (8): 54-63 .)
- [47] 李萍, 杨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J]. 现代哲学, 2020(5): 1-11 . (Li P, Yang Y . Public and private view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nd distinguish their modern value[J]. Modern Philosophy, 2020(5): 1-11 .)
- [48] 郑开. 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以“道德之意”为中心的讨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1): 179-203, 208 . (Zheng K .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aoist metaphysics: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meaning of the Dao or way and its power"[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7(11): 179-203, 208 .)
- [49] 刘泽华. 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9 . (Liu Z H . China' s monarchism: An investig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2000: 2-9 .)
- [50] 王宏强. 韩非子“术”论新探[J]. 人文杂志, 2024(2): 83-97 . (Wang H Q . A new probe into Han Feizi' s theory of "Shu"[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4(2): 83-97 .)
- [51] 党圣元. 回到原点: 再论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1): 47-58 . (Dang S Y . Back to the origin: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merger of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work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J]. 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50(1): 47-58 .)
- [52] 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23-28 . (Zhang Q Z . A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M]. Xi' a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28 .)
- [53] 孙中原. 墨学通论[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17-30 . (Sun Z Y . General theory of mohism[M].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3: 17-30 .)
- [54] 王中江. 道家形而上学[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229-239 . (Wang Z J . Taoist metaphysics[M].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229-239 .)
- [55] 陈鼓应. 老庄新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12-227 . (Chen G Y . New theory of Laozi and Zhuangzi[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212-227 .)
- [56] 陈来. 儒学美德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383-397 . (Chen L . On Confucian Virtue Ethics[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383-397 .)
- [57] 张会平, 赵溱, 马太平, 等.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的两种模式与生态系统构建[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3, 13(6): 29-42 . (Zhang H P, Zhao Q, Ma T P, et al. Two modes and ecolog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ata element market circul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3, 13(6): 29-42 .)
- [58] 门理想, 张瑶瑶, 张会平, 等.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收益分配体系研究[J]. 电子政务, 2023(11): 14-27 . (Men L X, Zhang Y Y, Zhang H P, et al. Research on revenu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public data authorization operation[J]. E-Government, 2023(11): 14-27 .)
- [59] 张恩典. 反算法歧视: 理论反思与制度建构[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5): 60-71 . (Zhang E D . Against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4 (5): 60-71 .)
- [60] 余厚强, 来昕, 张洋. 迈向智能信息计量: AI在计量领域的应用[J/OL].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26-03-17].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478.G2.20260108.1705.002> . (Yu H Q, Lai X, Zhang Y . Towards intelligent infometrics: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infometrics[J/OL].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 [2026-03-17].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478.G2.20260108.1705.002> .)
- [61] 周文杰, 周晓英, 闫慧. 信息资源管理的“双链互构”理论框架: 演绎归纳与应用场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6, 52 (1): 79-99 . (Zhou W J, Zhou X Y, Yan H . The "dual-chain interconstruc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ductive induction and application context[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6, 52 (1): 79-99 .)

(收稿日期: 2026-03-29)